

《給現在的我》

不簡單的戲劇性電影



《給現在的我》劇照（網上圖片）

《給現在的我》的香港中文譯名惹人想起張婉婷導演的《給十九歲的我》，都是電影工作者走進校園，為中學生留下了一段成長紀錄。《給現在的我》的導演Éric Baudelaire花了4年時間，走進巴黎市郊的聖但尼（Saint-Denis），為Collège Dora Maar的一群初中生籌辦了一個電影工作坊。異於《給十九歲的我》由成年人拍攝學生生活的做法，Baudelaire把攝影及錄音器材交給學生們，教他們使用，讓他們選擇拍什麼。所以《給現在的我》並不是簡單的「學生成長紀錄片」，而是有關電影工作者和學生一起透過影音媒介反思社會身分，並探討「什麼是電影」、「戲劇和紀錄片有何分別」等問題的後設電影。

文·賴勇衡



有些人把《給現在的我》歸類為「參與式紀錄片」（participatory documentary），強調拍攝過程的民主化。媒介學者Antoni Roig Telo概括了「參與式電影」的幾個主要條件：自願參與、討論空間、決策過程、可持續發展的技能，以及成員間彼此認可各自的貢獻。由此《給現在的我》帶出兩個問題：這是否一般觀眾心目中的紀錄片？所謂「參與式」製作中，導演和學生的關係到底有多「民主」？看來導演正是要透過此片探討這些問題。

學生參與 導演為成品負責

電影製作過程跨越了參與者的整個初中時期，但沒有章節分明的結構，只是大致按時序鋪排。片首還是童稚小孩的學生，在片尾已長成青少年的模樣。導演沒有使用畫外音來主導敘事，整體的結構或會令一些觀眾感到散亂。電影在幾個主要元素之間交錯：學生就這個電影計劃本身或社會議題小組討論、就這些題目的個人訪問、學生在校園拍攝的狀況、學生各自拿了攝錄機在家或街外拍攝的影像。

Baudelaire曾在一個訪問中表示，他很清楚自己仍是這電影的作者，並要為最後的成品負責。雖然學生有

很大的自由度去試驗並決定拍攝什麼，但最後電影的呈現方式並不由學生主導，而是由Baudelaire及剪接師Claire Atherton合力完成。所以「參與式電影」在實踐上，專業電影工作者和參與者之間的合作及權責關係往往按具體情景而變化。電影學者Jamie Chambers針對在學校的電影教育情景，探討教師/專業電影人與學生「共同創作」（co-creation）的電影製作模式，反思過分浪漫化的「參與式電影」概念。他指出，按電影合作計劃的條件和學生的程度等方面的差異，實際上負責這些計劃的電影工作者/教師和學生之間的關係須因實際情況而調整。對於大學電影學系的學生來說，他們當然需要很高的自主性去創作，但對於像《給現在的我》那些初中生而言，則需要更多的指導或其他來自導演的「干預」。

兩「法國」男生辯論出身

《給現在的我》中最有趣的場景，大都來自學生之間的討論。Collège Dora Maar和巴黎市中心相比，屬於中下階層的社區，很多學生都有移民的背景。他們對移民政策、總統候選人的政綱和恐怖襲擊等圍繞其生活的事情都有切身的感受和自己的觀點。在片中數場學生討論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兩個男生David和Guy-Yanis有關「出身」（origin）的辯論。他們都在法國出生的移民後代，David父母來自羅馬尼亞，Guy-Yanis的父母來自象牙海岸。David認為「出身」等於「出生」，所以Guy-Yanis和他都是出身於法國；Guy-Yanis則堅持既是法國人，也跟父母同樣出身於象牙海岸。或許這場討論的題目來自導演，但兩個男生之間自發又活潑的互動，則是難以預先計劃的精彩之處。

與這兩男生對照的，則是由女生Alyssa引伸出來的階

級敘事：她學打鼓、高中轉到巴黎市中心較好的學校、父親跟她討論為何反對外勞/移民。她似乎是家境較好的學生，而其他同學則由此談起兩區學校之間的文化差異，以及大眾媒介對聖但尼這地區構成的「治安差劣」等刻板印象。

高度自覺 反思社會議題

在這些討論場景中，學生顯示出高度的自覺性和反思，而言及不單有關社會議題，亦涉及電影製作本身，這亦帶我們回到《給現在的我》算不算「紀錄片」的問題。片首的學生討論「電影可以關於什麼」的問題，有的想是拍攝校園生活的紀錄片，有的則想拍超級英雄的虛構故事。導演讓他們拍了不同的東西，從中選擇剪輯。

此片原名是「一齣戲劇性的電影」（*Un Film Dramatique*），但顯然導演最感興趣的並非虛構戲劇。他沒有把學生製作的虛構戲劇成品剪輯進去，而呈現他們的拍攝過程。後退一步反思的「戲劇性」比戲劇本身更加引起導演的興趣。而原本的片名其實也來自學生David；他和其他同學辯論「怎樣分辨聲音和噪音」、「這是否紀錄片」之類有關「電影與真實」的問題。這部分的關鍵，是學生在探討影像和聲音的關係，試驗聲畫分離的效果。「戲劇性」大概來自學生對媒介特性及成為電影製作者的自覺，亦指向一個介入現實的位置。

Chambers借用《電影筆記》前編輯Alain Bergala的「擺渡人」（*passer*）概念，提出主持共同創作的電影教育者應向學生分享「與電影相遇」的個人經驗和品味，在對話中延續着電影文化。不知那些進行電影聲音實驗的學生是否知道，導演帶着他們向高達及安東尼奧尼致敬？

